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

MAKESIZHUYI RENXUE ZHONGGUOHUA XINTAN

辛世俊◎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013067889

C91
240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

MAKESIZHUYI RENXUE ZHONGGUOHUA XINTAN



辛世俊◎等著



北航

C1675543

人民出版社

C91

240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辛世俊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ISBN 978-7-01-011806-2

I. ①马… II. ①辛… III. 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299 号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

MAKESIZHUYI RENXUE ZHONGGUOHUA XINTAN

辛世俊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5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806-2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BKS013)

郑州大学重点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
振兴行动计划资助

目 录

导 言	1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1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主要问题	7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	1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23
一、体现时代的要求	23
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30
三、借鉴其他政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	3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43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根据	43
二、中国传统人学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历史文化土壤	62
三、西方人学思想和文化传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养料	87
第三章 毛泽东人学思想	99
一、人性与人的改造	99
二、人民主体论与尊重人的价值	114
三、人的平等与人的解放	129
四、群众路线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54
第四章 邓小平人学思想	173
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	173
二、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	190

2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

三、建设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	203
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	231
五、制度建设与人的发展	256
第五章 江泽民人学思想	274
一、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75
二、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299
三、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22
四、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44
第六章 胡锦涛人学思想	362
一、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362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386
三、培育和谐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396
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411
五、注重人文关怀	421
六、建设精神家园	430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实践效应与前景展望	439
一、从人的解放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实践效应	439
二、新的历史方位下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458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前程展望	475
结 语	492
参考文献	494
索 引	498
后 记	501

导 言

“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这两个概念得到中国学术理论界认可的时间并不长,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得益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落实,得益于学术界同仁的不懈探索与努力。能够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亲眼目睹中国人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我们既感到激动与振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实践出真知,经验是财富,人的阅历能加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人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学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标签,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谈人,而无产阶级则只讲斗争、革命、专政等。在“谈人色变”的极“左”年代,“人”成了一个禁区。正因为人学研究的历史不是很长,在一些人那里,人学可能还比较“陌生”,所以,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基本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 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大举措,也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根本要求,这一论断对于学术理论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新探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具有当今中国实践的根据,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①

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强调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又要研究中国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①

事非经过不知难。现在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似乎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认识的层面来看,任何认识都是复杂的,都涉及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以及二者的结合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认识马克思主义,又要认识中国国情,还要解决二者的结合形式。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30—40年代,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内展开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任何理论都要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指导的革命实践,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革命受苏联的影响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胡乔木指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共产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成很多困难。^①

胡乔木指出,20世纪40年代,我们提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为了在全党形成思想的统一,还有针对苏共的含义:

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命题。从理论的层面来看,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理论体系。如果再进行细分,其理论内涵更加具体,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学学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学理论,甚至也没有“人学”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其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人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揭示出人学理论的框架和结构。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化,否则就难免陷于抽象和空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命题。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但真正把人学问题明确提出来,并得到深入研究,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关。胡锦涛在党的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深刻指出：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①

对于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进程的人们来说，特别是能够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进行比较的人来说，对这一论断的感受特别深刻。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国的巨大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变化，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人的觉醒的过程，是人的发现和人的回归的过程，是人的主体地位被重视、人的价值被肯定、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的过程。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问题”是一个禁区，人道主义和人权都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人的阶级性被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与个人有关的很多问题都被说成是“个人主义”而成为批判的内容，人的幸福和尊严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丰富的人学思想被遮蔽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话，那么，人学和马克思主义人学被理论界的认可，并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一历史进程毫无所知，就难以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在理论界，“人学”已经得到了认可，但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人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关键在于认识 and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人学”思想；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是不是真的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指导思想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前一个问题，学术理论界已经做了肯定的回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发掘、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取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 页。

得了重要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王锐生、景天魁著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黄楠森、陈志尚等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集体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研究》,陈先达、靳辉明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们集体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袁贵仁著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韩庆祥著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辛世俊、滕世宗著的《邓小平人学思想》,等等,这些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的一大批论文和专著的发表,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学上的宝贵理论遗产,阐述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①

对于第二个问题,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人学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确实受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指导,并存在着前后相继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不仅提出了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学观点,而且自觉地以这些人学观点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譬如,毛泽东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论述,关于武器与人的关系的论述,指导我们在经济落后、环境恶劣、武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大无畏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四有”新人的论述,具体转化为全民参与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人学思想,加深了我们对苏东剧变的反思,提高了拒腐防变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使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关注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为解决社会转型期凸显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思想武器。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两个基本前提,即理论前提和实践基

^① 参见陈志尚:《人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人学理路——第十一届全国人学研讨会文集》,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础。所以,就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应在这两个方面下工夫。

在理论前提方面,我们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人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总体理论和总体精神出发,力争做到对其精神实质的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实践中产生,又给实践以指导。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过程是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在实践前提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对中国革命、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史)的研究,力争做到结论从实践中来。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涉及的问题很多,本书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与时代的发展、实践的要求、人民的需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有密切的关系。本书的研究,从时间来看,从党的成立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几个重大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人学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尽相同。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指导实践时,往往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不同方面提到首要的地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特点。列宁在 1910 年年末和 1911 年年初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再次得到验证。譬如,在民主革命时期,

推翻三座大山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政治解放的学说必然被提到首要地位,也必然在毛泽东人学思想中凸显出来;要推翻三座大山,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于一个处于没有政治地位、不掌握任何权力,被执政者视为“共匪”的共产党来说,必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精神。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也必然强调人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的“人的能动性思想”必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人学思想中有所体现;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一切运动的特点是以前的运动是为了少数人的运动,而现在的运动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运动,这就必须依靠群众,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这一思想具有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1978年,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的时候,还有很多条条框框、极“左”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就成为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需要迫切解决的任务。为此,邓小平人学思想就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中思想、观念解放的内容,这无疑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随着苏东剧变和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对准中国,利用“人道主义”、“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人道主义”、“人权”成为西方国家的“武器”,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分析了当今社会的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不仅回应了西方对我国的攻击,而且廓清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领域的许多糊涂认识。当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在全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全党的面前。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文明”的概念,并阐明其内涵和建设精神文明的战略意义,并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

进入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简练清晰的语言形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党和人民关系的论断,把执政的合法性、长期性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明确

了党肩负的重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人学意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譬如,如何在新形势下代表人民的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如何在新形势下依靠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等等。在苏东剧变、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论断,全面阐述了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切中了已经凸显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时弊。

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虽然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的这八个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正是这些阶段性特征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不仅再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是目的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

人文主义传统的“对接”,而且体现了共产党人博大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实现了“三个一致”:即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与世情、国情、党情紧密结合的过程,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离开中国的国情(历史、实践、文化),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就会失去现实基础而没有任何意义。

2.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认真研究的。在这方面,我国虽然出版了一些专著,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对其理论观点和精神实质的把握,仍然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这就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特殊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民族特点,只有同中国具体民族特性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郭建宁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同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①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人学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形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得以生长和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从本质上看,就是人伦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中蕴涵着大量的关于人的学说,譬如,管子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再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是丰富的思想资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概念和表述方式,与中国古代人学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正如胡锦涛 2006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的: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②

毛泽东的读史笔记和一系列著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著作、讲话等文献中记载了他们学习、研究、引用中国古代文献(包括人学思想)的大量例证,充分说明了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

西方文化传统的人学思想源远流长,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中人学思想非

① 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8 页。